

体育民族志的研究视点及其启示

田恩庆¹, 仇军²

(1.上海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上海 200234; 2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要: 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 SSCI 数据库收录的 3 本体育社会学期刊 IRSS、SSJ、JSSI 中刊载的 116 篇体育民族志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当前体育民族志研究视点多元, 涌现出本土民族志、海外民族志、虚拟民族志和自传民族志、个人生活史以及反思性研究等不同式样的文本, 为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诸多启示。

关键词: 体育人类学; 体育民族志; 综述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6)01-0092-05

Sports ethnography: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inspirations

TIAN En-qing¹, QIU Jun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content analysis, the authors analyzed 116 articles about sports ethnography, published in such 3 sports sociology journals as IRSS, SSJ and JSSI collected in SSCI database, and concluded that currently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es on sports ethnography were diversified, including local ethnography, oversea ethnography, virtual ethnography, autobiographical ethnography,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and reflective study etc, providing a lot of inspirations to the change of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es on sports anthrop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a.

Key words: sports anthropology; sports ethnography; review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家记述可信而严谨的真实故事, 常以逐字逐句引用被研究者的话语及其对事件过程的“深描”, 使他们在自身文化背景中发声。这种以当地人的视角所描绘出来的事件形象而生动, 以现实生活构成的社会文化中独有的生命体验, 能够在“整体生活方式”的语境和“自然化”的背景下考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 民族志研究有利于拓展知识和视野, 加深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理解^[1]。

在探讨文化、国家、民族和社会(社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体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而体育民族志作为体育人类学重要的研究形式, 为考察人们与体育相关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社会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记录个人或群体与体育相关的生活体验和感受, 可以使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诠释体育的深刻内涵。由于人类学发端于西方, 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相对丰富, 而在我国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学科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 因此亟需梳理当前西方学界运用民族志方法, 阐释体育文化实践以及研究反思, 为促进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提供借鉴。

当前国际尚未出版发行专门的体育人类学期刊, 大部分体育民族志研究发表在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期刊, 故本研究选取被 SSCI 数据库收录的国际体育社会学领域同行评议期刊《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IRSS)、《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SSJ)、《体育与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JSSI)上的民族志研究文本共 116 篇进行分析(检索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同时由于“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描述的研究方法, 可以有效梳理学科研究成果、掌握学科发展趋势和不足, 推动科学的创新^[2], 本研究运用该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

深入探讨，旨在了解西方体育民族志的研究特点及其对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1 体育民族志的多元研究视点

1.1 “海外”与“本土”体育民族志

对本土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可能导致人类学描述的非真实性，因为研究者通过熟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谈论其“本土”文化，研究者因熟悉“日用而不知”，或者是在研究过程中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因此在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人类学家往往认为越远离家乡之地就越适合开展田野工作，这种“纯正级序”的观念使人类学研究成为书写“远方文化的迷”^[3]。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人类学家在海外从事民族志研究，不仅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人类学家们，把来自殖民地中所谓的“异文化”作为研究或“猎奇”的对象，而且可以便捷选取研究地点、离开自身熟悉的社会环境进行跨文化研究。

体育作为当代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海外民族志”研究议题之一。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共计30篇样本运用了这一研究视点，其中研究者一般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研究田野选择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来自加拿大的研究者对“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国际政策持怀疑态度，以北柬埔寨举办的足球联赛运动计划及其实施的效果进行了田野调查^[4]；来自美国学者凯尼恩^[5]先后对北美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棒球进行民族志研究，讨论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问题和在多米尼加棒球中全球商品新自由主义的例外等。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大部分海外体育民族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都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英国是从事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相对较多的国家，其次澳大利亚、美国与意大利，而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家的体育现象也受到海外民族志研究者的关注。

虽然海外民族志对文化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但对本土文化的探讨“不仅是可取的，还可能标志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新发展”^[6]。因此，许多敏锐的研究者打破这种人类学研究的地域局限，观察到本土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学术研究潜力，把视角从“海外”转向“本土”，涌现出大量本土研究案例，当前的体育民族志也表现出这一趋势。通过内容分析发现93篇文章涉及到本土民族志的研究，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本土体育民族志研究者较多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有部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法国，这些国家体育发展相对成熟，并对社会影响深刻，从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总之，所选样本中无论是“海外”还是“本土”

体育民族志，其研究者更多来自欧美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所持的研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蕴藏着后殖民时期“欧美中心主义”的色彩。

1.2 “现实”与“虚拟”体育民族志

在所选的样本中，大部分研究者运用传统的民族志方法，通过选取某个特定的、能够形成社会关系和互动的“物理空间”作为田野调查点，然后进入和融入田野展开研究、撰写田野笔记，离开田野后进行民族志书写等步骤。体育民族志研究者选择的田野调查点主要包括与体育相关的场所，例如健身房、各种体育俱乐部、城市公园(如芝加哥格兰特公园)等，此外还有体育相关机构工作场地成为民族志的研究田野，这主要是根据研究对象特点而定。

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行动开创了一种有别于现实社会的公共空间，即“网络空间”，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的传播。作为关心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来说，学者们提出“虚拟民族志”或“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隐喻”，成为互联网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近年来，虚拟民族志也开始应用到与体育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中。例如诺曼·马克^[7]在考察加拿大广播公司转播2011年曲棍球比赛中互联网用户如何评价比赛，其田野调查全部在新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进行。“博客”也成为体育虚拟民族志研究的田野，例如麦基与达耶尔^[8]以加拿大一个女性滑板网站“博客”为田野，跟踪分析262位女性滑板运动员的网络日志的内容及其变化趋势，运用福柯的相关理论探索女性话语的替代方式。

由于网络环境沟通模式已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也产生变异，传统意义上研究者作为“参与者”或者“参与观察者”的身份也发生改变，而且还存在关于研究伦理的争议。纵然如此，研究者借助互联网的表达和交流平台、软件工具等方式观察被研究者的文本、图像或情感符号及其网络中的社会互动，“不至于扰乱自然发生的行为，降低因研究者的在场而扭曲资料和行为的危险”^[9]。

1.3 “他者”的体育叙事与自传民族志

在人类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对“他者”和“自我”之间的争论，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通过殖民的方式向边缘的弱势文化渗透，以西方人的本土宇宙观观察和重构异文化并将其视为“他者”。在关于“他者”和“自我”的人类学反思中，这对概念是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成为西方人类学发展史的一条主要线索^[10]。

如前文所述，体育人类学研究涌现出大量典型的“他者”，主要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殖民国)的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被殖民国)，以及被认为是“落后”民族进行的人类学研究。除对加勒比海、柬埔寨、赞比亚、印度、巴西、朝鲜、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也有对本国、本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特殊人群的调查，如对英国伊斯兰宗教独立学校中，穆斯林男性青少年在生活和宗教中如何建构男性气概的探讨；对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土著居民的传统沙地游戏体育比赛中妇女的角色的分析，对特殊人群如患有抑郁症的儿童和青少年、脊髓损伤的运动员以及同性恋群体的研究等。

相对“他者”民族志研究而言，当前涌现出“自传民族志”，记录个人和社会文化相关的“自传式”叙事，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描述为核心并对其进行反思。这种源于传统民族志，但区别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关注研究者自我主体性意识，描述自身的体验和观点，这种方法在体育研究中得到应用。例如，达什皮尔^[11]以自传民族志的方式记录自己因赛马使脸部受伤后的经历，从而能解释性别认同和体育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安德烈洛朗^[12]记录自己参与定点跳伞的亲身经历，强调风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空间不确定性的描述，指出文本叙事多元声音具有丰富的学术潜力，并认为自传民族志的书写就是一种调查方法，应得到广泛运用。

由于自传民族志是基于情景记录个人叙事，可能存在虚构，追求浪漫的形式，算不上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这种叙事方式提供“了解体育的社会与文化的角色一个全新的视野”^{[11]328}。

1.4 个人体育生活史研究

论及研究深度，在民族志研究中的开放式访谈所使用的方法中莫过于“生活史”研究，这是一种被调查个体对田野工作者运用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综合图景，提供给人们以社会文化最为微观的窗口。虽然口述生活史研究存在种种不足受到质疑，但能够提供极其丰富的文化视野了解讲述者对文化自身的解释，提供观察文化和社会行为本质不断变化的历时性视角^[13]。

在体育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也常常采用个人口述生活史的方法。一方面是针对运动员的体育生活史的研究，例如，伟奇伍德^[14]研究澳大利亚高中女子澳式足球队 19 名女足球运动员的生活经历，探讨性别权力关系及交际模式中的经验和地位。贝尔格·约翰斯^[15]对运动员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饮食问题进行探讨，追踪艺术体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史，论述在现代体育中，

即“竞技体育超越身体的极限，但同时又对身体进行保护”这一矛盾的观点。科里^[16]通过 7 个月的田野调查，对大学退役搏击运动员的生活史进行研究，解释校园酒吧在促进男运动员攻击和性骚扰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与体育相关的工作人员的生活史也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赛克斯^[17]对加拿大 6 名女性体育教师进行生活史访谈，运用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解释为什么在女子体育教育中的“衣橱”具有的特征，并运用解构主义视角阐明异性恋为何会发现自己在衣橱里女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界限。

源自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生活史”研究，作为民族志文本的一种形式已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对体育相关的个体和行动进行的历史与文化的解释，可以从个人的日常生命轨迹中理解，探究体育社会行为的动因，寻觅体育运动中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的脉络，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对个人生活史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2 体育民族志研究的启示

1)由于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经验研究具有极强影响的学术背景之下，以 1977 年人类学家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为标志，其后人类学反思蔚然成风，主要通过民族志方法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支撑的价值观、理论假设等存在的各种层次的问题或者对未来研究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之中，人们通过社会化的生产生活赋予体育行动以意义，并再生产意义。当代西方体育民族志研究聚焦于体育行动中，其意义系统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例如，体育中的性别认同、集体身份表达、弱势群体通过体育获得社会地位等。纵观当前的体育民族志研究，可以发现被研究对象与周围的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以及他们选择认同或抵制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权力关系，如性别、种族、知识或者职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关注形态多样的体育亚文化(如女权主义，弱势群体、同性恋、少数民族/种族群体)研究中，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平等或者为这些弱势文化寻找合法空间。然而，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人们注意到许多亚文化已经被边缘化，在当代社会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许多研究很难达成这一目标。研究者发现很难根据社会结构的激烈变化获取被研究者所认为真正的、直接意义上的诉求，而需要依赖于为边缘文化敞开空间让被研究者说话，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思考，最终致力于“为亚文化获得自身

合法性而创造空间”^[18]。

金·怀特^[19]认为体育民族志仅仅“为研究和写作来讨论身体文化”是不够的，民族志的田野研究需要表达更有效“社会正义”，并如何对体育相关的研究议程产生深远影响。在诸多体育民族志研究中，调查者应是“批判性干涉主义者”，由于研究者可能拥有特殊的“权力”，需要意识到对自己的研究必须保持自我反思能力，有责任说出真相、揭穿谎言，在研究和写作中保持诚实。因此，体育民族志需要实现从“关于身体的写作和研究”到“通过身体的写作和研究”的超越，注重将我们的身体镶嵌于研究行动之中，并在这一领域中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吁，否则“我们的学术空间将变得愈加狭小”。总之，体育民族志的反思性研究视角昭示，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自我反思的民族志”^[20]，而且，体育研究者需要在自我反思中学会处理权力问题、倾听和合理展现“弱者的声音”，并长期同理论进行对话，诚实对待被研究者和自己，最终以自己的行动维持和实现“社会正义”。

2)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开始起步并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诸如黔东南独木龙舟^[21]、广西南丹拉者村“斗牛斗”^[22]、南部侗族“抬官人”^[23]、纳西族的“东巴跳”^[24]等一批优秀的体育民族志成果，但通过对西方体育民族志的部分研究内容的详细分析发现，当前我国体育民族志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高度关注我国人类学本土研究传统，强调“对‘残存’体育文化形态的纵向研究”^[25]，但对现代体育问题探讨不够。纵观西方体育民族志成果，其研究对象极少涉及到所谓“原始”残存体育文化，而是考察现代体育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具有争议的话题，研究内容从体育中的性别、种族、移民等典型社会问题到观众、球迷的越轨行为，从票贩子、社会弱势边缘群体到中产阶层的体育参与的新议题，从精英竞技项目到休闲、极限体育运动项目的关注，从肥胖、运动伤病到健身健美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些研究议题无一不与现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国人类学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通过文化现象发生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令人信服地阐释身体运动对人类文化萌生的贡献”^[26]，而且还需要有其更广博的研究范围及更深入的研究内涵，将其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察全球化背景之下，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体育发展过程的重大议题。

其次，我国体育民族志研究视点和方法较为单一。正如前文所述，近年来我国涌现出的优秀民族志文本中，主要是通过观察和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对我国

少数民族“残存”体育文化的“本土”研究，按照我国人类学的“三圈说”^[27]，大部分研究成果是华夏“核心圈”的研究者对“中间圈”和“边缘圈”体育“异文化”的探视，这些研究文本并不能视为“海外民族志”，其研究难以超越“局内人”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模式。当前，我国仍然缺乏诸如海外民族志、自传民族志、虚拟民族志、个人体育生活史等具有多元研究视点和研究方法的文本。而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之下，急需要运用多样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去阐释体育参与主体的思想和行动及其行动背后的逻辑，需要让被研究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体育亚文化的合法化发展提出独特而具有建设性意见，如有可能还应成为实施这些建议的行动者，才能够使研究更加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的社会意义。

此外，我国体育民族志反思性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足，较少出现专门探讨权力关系、价值取向、写作方式、研究方法运用等问题，也少有研究者通过重访田野反思自身研究，对当地被研究者的体育生活及其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当前，由于研究者往往根据个人兴趣进行民族志调查，其研究成果只能发表在拥有较少读者的学术期刊或展示在少数同行参加的学术会议中，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似乎印证了体育人类学家罗伯特·桑德斯对当前体育人类学“正在走向衰落”的忧虑^[28]，突显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危机。但是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隐喻，深刻塑造个体、社区(社群)、国家(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关注日常生活实践的体育民族志研究来说，深入阐释体育在特殊社会环境和文化实践中的意义和角色，对于面临社会重大转型的当代中国具有现实意义。无论如何，当前仍需要更多体育人类学研究者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深刻的学术反思，不断拓展研究视阈，保持与理论和实践的对话，努力使自己具备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和“民族志的洞察力”^[29]，用心去倾听、记录转型时期的社会个体(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创造历史，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中充分体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30]，实现从“关于身体的写作”(write about body)到“通过身体的写作”(write through body)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体育人类学的面貌才能够焕然一新。

参考文献：

- [1] FETTERMAN D M.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M].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9: 1.
- [2] 赵蓉英. 内容分析法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探讨[J]. 图书情报工作, 2005, 25(6): 18.

- [3] 王铭铭. 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J]. 西北民族研究, 1996, 10(2): 128-142.
- [4] OKADA C, YOUNG K. Spor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mise and caution from an incipient Cambodian football league[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2, 47(1): 5-26.
- [5] KLEIN A. Chain reaction: neoliberal exceptions to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in Dominican baseball[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2, 47(1): 27-42.
- [6] 费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国: 东亚社会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2.
- [7] NORMAN M. Saturday night's alright for tweeting: cultural citizenship, collective discussion, and the new media consumption/Production of hockey day in Canada[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2, 29(3): 306-324.
- [8] MACKAY S, DALLAIRE C. Skirtboarders.com: skateboarding women and self-formation as ethical subjects[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3, 30(2): 173-196.
- [9] BEAULIEU A. Mediating ethnography: objectivity and 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es of the internet[J]. Social Epistemology, 2004, 18(1): 2-3.
- [10] 孟航. 西方人类学发展史的再认识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在“他者”中理解“自我”[J]. 广西民族研究, 2007, 23(3): 53-65.
- [11] DASHPER K. Getting better: an autoethnographic tale of recovery from sporting injury[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3, 30(3SI): 323-339.
- [12] LAURENDEAU J. “If You’re Reading This, It’s Because I’ve Died”: Masculinity and relational risk in BASE jumping[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1, 28(4): 404-420.
- [13] 章桃. 生活史——听生活讲述它自己的故事[J]. 图书情报知识, 2010, 28(1): 36-40.
- [14] WEDGWOOD N. Kicking like a boy: schoolgirl 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 and bi-gendered female embodiment[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04, 21(2): 140-162.
- [15] BERG J D. Fasting and feasting: paradoxes of the sport ethic[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8, 15(1): 41-63.
- [16] CURRY T J. Beyond the locker room: campus bars and college athletes[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8, 15(3): 205-215.
- [17] SYKES H. Turning the closets inside/out: towards a queer-feminist theory in women’s physical education[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8, 15(2): 154-173.
- [18] KING-WHITE R. Oh henry!: 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pedagogical imperative[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2, 29(3): 385-408.
- [19] KING-WHITE R. I am not a scientist: being honest with oneself and the researched in critical interventionist ethnography[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3, 30(3SI): 296-322.
- [20] MADISON P S. Critical ethnography: methods, ethics and performance[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5: 236.
- [21] 胡小明, 杨世如, 夏五四, 等. 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一)[J]. 体育学刊, 2009, 16(12): 1-8.
- [22] 陈奇, 杨海晨, 沈柳红. 一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广西南丹拉者村“斗牛斗”运动的田野报告[J]. 体育科学, 2013, 33(2): 30-37.
- [23] 谭广鑫, 周志俊, 许爱梅, 等. 巫风武影: 南部侗族“抬官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查报告[J]. 体育科学, 2014, 34(3): 62-71.
- [24] 和春云, 胡小明, 葛锦润, 等. 东巴跳源于纳西族丧葬舞蹈的田野调查[J]. 体育学刊, 2014, 21(1): 114-117.
- [25] 杨海晨, 王斌, 沈柳红, 等. 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J]. 体育科学, 2012, 32(2): 81-87.
- [26] 胡小明. 人类学方法进入体育研究的新阶段[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44(5): 5-9.
- [27] 王铭铭. 三圈说——另一种世界观, 另一种社会科学[J]. 西北民族研究, 2013, 16(1): 82-99.
- [28] SANDS R. Sport ethnography[M].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2002: 3.
- [29] 郭于华.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21.
- [30] 仇军.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2, 38(10): 10-13.